

· 国外经济学家评介 ·

# 伊莎贝尔·索希尔对贫困问题研究的贡献\*

徐静 吴慈生

**内容提要:**伊莎贝尔·索希尔是美国著名女性经济学家,她以美国社会贫困问题为视角,透析了社会底层阶级、女性歧视、婚姻、教育等因素对社会贫困的影响,揭示了产生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提出了社会贫困的测度标准。索希尔不仅在产生贫困问题的社会家庭关系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社会不平等、流动性和福利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她的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对华盛顿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关键词:**贫困 社会底层阶级 女性歧视 家庭结构 公共政策

## 一、伊莎贝尔·索希尔生平简介

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是美国当代著名女性经济学家,1936年出生于美国。1955—1958年就读于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随后就读于纽约大学,先后于1962年获该校文学士学位,196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公共政策问题。1968—1969年间,索希尔担任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规划和评估助理秘书处等机构的政策分析师。1970—1973年间担任美国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1973—1997年间长期供职于城市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担任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Senior Fellow),并担任该研究所就业与劳动政策的项目主任、国内重点工程变革部(Changing Domestic Priorities Project)主任。期间,她于1977—1979年间担任国家就业政策委员会合作主任、主任;1993—1995年间担任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人力资源部项目副主任。1997年至今供职于布鲁金斯学会,先后担任该学会的经济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副主任,儿童和家庭研究中心合作主任,国家重点项目预算部合作主任。索希尔所获得的诸多荣誉包括:2014年度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局联合会模范奖(Exemplar Award),2015年度莫伊

尼汉学术奖(the Academy's Moynihan Award),2016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Distinguished Fellow)。

在过去40多年中,索希尔凭着自身独特的经济见解,极大地影响着华盛顿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她一方面利用有效的实证数据,提炼出自己独树一帜的观点;另一方面,她运用经济学理论或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和解决了许多与公共政策直接相关的问题,为政府提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索希尔研究领域广泛而深刻,但多年来始终致力于探索和研究社会贫困问题,尤其是由女性歧视、离婚、单亲家庭等因素所带来的社会贫困问题。比如,索希尔认为,尽管女性工作任期和男性一样,但女性在工作任期内得到的提升空间却是有限的,该观点近几十年来始终影响着其他相关研究者所做的进一步探索。与此同时,单亲家庭问题也是索希尔长期以来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她在全面考察单亲家庭对儿童幸福感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关于解决单亲家庭以及如何提高美国弱势儿童生活状态的政策建议。其相关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美国的贫困问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拓宽了我们认识福利政策及其对家庭、教育、贫困、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美国财政预算等方面影响的视野。

尤其是,索希尔关于美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以其

\* 徐静、吴慈生,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30009,电子邮箱:ahljysy@126.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JY0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新颖独特的观点,激发了新一代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热情。为此,本文依据索希尔对社会贫困测度、社会底层阶级贫困、女性歧视、家庭结构、教育、福利政策、社会流动和不平等研究成果,主要梳理和阐释了她对美国贫困问题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 二、贫困问题的宏观研究

### (一) 贫困测度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美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要社会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招募了一批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开始重点研究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针对贫困的标准、社会底层的概念划分进行了界定和衡量,并制定出相应的脱贫计划,同时还不断地对计划进展进行评估、检验和修正。经过多年的努力,虽然关于贫困研究的大体框架已基本形成,但理论界依然存在着以下悬而未决的问题:(1)怎样定义和划分贫困?(2)美国在减少人口贫困率及各类贫困群体的问题上,到底取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展?(3)取得这些进展的原因是什么?(4)为什么贫困人口减少达不到最初预期?索希尔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研究,并在其发表的《美国的贫困:为何如此持久?》(Sawhill,1988)一文中,不仅对贫困的定义及其划分标准做出了开创性界定,还依据贫困线划分,完善了关于社会底层阶级的概念框架,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关于贫困的测度标准,美国官方是基于Mollie为美国社会保障总署制定的标准发展而来的(Orshansky,1965)。当时的贫困线和家庭基本收入是根据一个家庭能否担负营养丰富的饮食费用来界定的,如果食物的支出占到了税后收入的35%以上,就可以视作贫困。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修改和完善,但原有的标准还只是一个静态的贫困线,无法动态科学地衡量贫困。为此,在质疑以下几个问题的同时,索希尔提出了社会贫困测度必须把握的如下四个维度:

(1)如何准确定义家庭需求?索希尔认为,应该针对家庭人数规模或所在生活环境的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从而进一步确定他们的基本需求,因为官方的数据会低估小家庭的基本饮食需求而高估大家庭的需求,同时也要衡量不同家庭在交通、健康等方面的差异性需求。

(2)如何定义收入?索希尔认为,应该使用税后收入代替之前的税前收入;不再简单地使用年收入

来衡量,要综合年收入与生命年金的贴现总额来考量。

(3)如何确定适当的“收入利益共同体”?索希尔认为,收入利益共同体划分有个人、家庭、家族等。一般情况下,壮年男性收入较高,妇女老人收入较低。当家庭成员作为整体进行统一核算时,往往会忽略家庭中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所以需要把家庭单位划分成更小的单元。另外,对家庭成员进行核算时,应考虑到部分成员(家庭主妇)闲暇时间等无形资产的效用。

(4)如何确定合适的统计周期?索希尔认为,日常的收入和消费有不同的统计周期(如一月、一年或一生)。对大多数人来说,收入和消费是一个相对指标,因此,贫困也是相对的,有些人的贫困是暂时性的,也有一些人的贫困是永久性的,这里需要分开讨论。

综合上述四个维度不难看出,索希尔认为贫困线的划定不仅要随着家庭人数的变化而变化,还要根据因地理位置差异带来的不同医疗成本、工作成本等因素来具体衡量。正是基于这些维度,她对贫困的内涵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界定。

与此同时,根据以上改进的测度标准,索希尔(Sawhill,1988)回顾了过去几十年关于贫困水平的发展趋势,她认为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在降低人口贫困率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进步不十分显著。为此,她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1)人口变化是造成美国贫困持久的主要原因;(2)宏观经济表现不佳;(3)对穷人投入少量及低效的人力资本;(4)对穷人不断进行援助,转移支付的增加改变了穷人的工作和家庭行为,这些改变抵消了转移本身的减贫效果;(5)越来越多的城市底层阶级出现,传统的解决方案不适用于解决他们的问题。

由上可知,索希尔不仅对贫困测度标准进行了大胆改进和实证检验,她还通过对近几十年来人口变化、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的变化、收入转移情况,以及社会底层人口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指出可以通过增加社会保险项目来健全卫生保健等基础社会福利。虽然美国政府目前实施的扶贫措施对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缓解作用,但随着失业率的上升,收入增速的放缓,贫困的概率还是有所提高。贫困人口群体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出生在贫困家庭或居住在贫困区域的后代增加了贫困的概率,如黑人的后代、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后代

等。同时,老年人口中的不平等收入分布也增加了贫困率。

## (二) 社会底层阶级界定

为了深入探索社会贫困问题,索希尔等(Ricketts & Sawhill, 1988)通过对社会底层的创新探索,更明确界定了社会底层阶级的概念内涵。不同于大多数研究社会底层阶级的文献,索希尔等重点研究了社会底层阶级贫困的行为表现,从而突破了以往仅从收入或地理集聚方面研究贫困的局限性,为研究社会贫困问题开辟了新视野。

根据索希尔等关于社会底层的定义,1980年美国人口中有百分之一处于所谓的“社会底层区”,且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为了深入研究,索希尔等根据教育背景、年龄、居住区域对贫困人口进行了分类和统计,认为如果不从概念上厘清社会底层阶级与贫困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仅仅探讨社会底层阶级定义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而当下流行的所谓“社会底层阶级”的讨论,并没有在诸如贫穷、失业、犯罪、福利依赖、单亲家庭、教育水平低、工作技能缺失等方面得到更为有效的关注,尤其在以下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1)底层阶级仅仅是穷人的新标签,还是代表了一个新的群体;(2)假设底层阶级和穷人是两个不同的集合,两者之间是怎样的包含关系;(3)区分穷人中的底层阶级需具备哪些条件。因此,当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时,对社会底层阶级的讨论将始终会被不同的标准和疑虑所困扰。无论是尝试估计人口规模、结构,还是对未来的增长速度进行预测,都依赖于对社会底层阶级定义的选择。而这种估计与预测又对社会问题研究以及公共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此,索希尔等对社会底层贫困进行了重新界定,强调底层阶级的行为是造成社会底层贫困的重要根源,而不仅仅是因为收入或地理集聚上的原因。索希尔等(Ricketts & Sawhill, 1988)参考了美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图表分析方法对底层阶级地区、人口规模和结构做出了初步的估计。索希尔(Sawhill, 2003)还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造成美国社会底层贫困的根源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金钱虽然可以改善穷人的艰苦环境,但如果不改变穷人的行为特征,那么金钱也将无法持续发挥作用。社会底层阶级贫困不仅与其行为有关,也和他们过去的生存状况有关。因此,索希尔(Sawhill, 2003)还指出过去的十五年,美国贫富差距已经恶化,具体表现在:一是富人拥有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而穷人则恰

恰相反;二是如果不改变穷人的行为特征,任何再分配政策都将无法解决贫困现象,公共政策往往只会让穷人的发展变得愈加糟糕,从而不断扩大贫富差距。

那么,如何让社会底层阶级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索希尔等(Sawhill, Winship & Grannis, 2013)认为除了社会政策的帮助以外,个人努力、避免社会陷阱、父母对孩子的选择负责任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弱势背景中成长的孩子,由于所居住的环境较差、机会较少,往往没有能力做出负责的正确选择。而当孩子真正有能力合理地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往往为时已晚。但如果把消灭贫富差距的全部责任都推给政府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即便没有政府的帮助,每个人都有可能白手起家取得成功。对于如何使底层家庭脱离贫困,索希尔等(Sawhill & Karpilow, 2013)依据短期(工资)、中期(就业状况)、长期(教育与家庭背景)三个不同层次的贫困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脱贫政策建议。索希尔等(Sawhill, Rodrigue & Joo, 2016)还通过比较这三个层次进一步指出,底层阶级家庭由于根本没有工作或工作时间有限,而造成贫困,这说明“工作”的差距是造成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即中期层次(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是主要的。

## 三、影响贫困的因素研究

### (一) 女性歧视对贫困的影响

作为当代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索希尔十分关心女性就业歧视所带来的贫困问题的特殊性。索希尔早期曾发表《一些关于歧视女性经济学的新发现》(Sawhill, 1973)一文,指出女性歧视是造成女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诸如不稳定的婚姻、生育、单亲家庭、就业歧视、性别歧视、教育培训缺失、薪酬不公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困,主要学术观点包括:

首先,不稳定的婚姻和生育是女性贫困和受到严重歧视的首要原因。虽然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使得女性有能力摆脱婚姻所带来的一系列贫困问题。但有证据表明,美国离婚率的趋势在不断增加。与1970年相比,仅1973年,美国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就增加了100万。尽管“男人供养家庭”是人们广泛接受观念,但这个观念在潜意识中阻碍了女性自身的发展,消磨了女性的竞争意识,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职场女性的收入。此外,生育也是女性失去就业机会的主要原因。孩子的出世增加了家庭开支,而这些女性

中大约 1/3 的人都将面临离婚,加之她们有些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从而加剧了她们的贫困。

其次,单亲家庭也是造成女性贫困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尽管现代女性拥有比过去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她们仍然处于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尤其是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其经济状况往往更加糟糕。根据调查研究,1973 年美国 25~40 岁之间的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年平均收入约为 6000 美元,而同等处境的男性主导单亲家庭收入约为 12000 美元,双亲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则高达 15000 美元。因此,约一半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会陷入贫困,从而依靠福利救济,但大多数男性主导的单亲家庭却能免于贫困。

第三,就业歧视、薪酬不公、教育培训缺失也是导致女性贫困的重要因素。虽然政府主要是通过增加就业机会、转移支付等救济手段,对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进行政策支持,但这些手段往往治标不治本。要解决根本问题,就必须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以及改变大众对女性社会地位所持的态度。如果在女性人力资本中,能消除肤色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如果能让大多数女性在职场上和男性挣得同样的收入,才能真正减少女性主导的单亲家庭的贫困,才能改善女性的经济地位。

为了进一步揭示女性歧视对贫困的影响,索希尔借鉴了 Bergmann(1971)等学者关于歧视女性经济学的研究成果。Bergmann 指出平等资格下的不平等就业机会是女性收入相对较低的一个根本原因。为此,索希尔基于男女薪酬的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根据 1967 年美国人口调查中未公布的数据,通过虚拟变量方法,对收入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对诸如种族、宗教、年龄、教育、周工作天数、年工作周数等变量进行调整修正之后,女性收入仍只占男性收入的 56%;与未修正的 46%相比,这 10%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男女工作周数和天数的不同。这个结果为女性就业歧视提供了新的证据。

同时,索希尔还从职业培训的角度,对女性就业的工作时间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鉴于未婚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积累更多的经验,她分别测度了未婚女性与男性、已婚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男性三个方面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即使所有女性都和未婚女性一样工作,也只能使男女收入差距降低一个百分点,即使女性收入占到男性收入的 57%。对于男女收入差异的来源,大多数人认为

一部分可以由男女工作起薪差异来解释,但这也仅仅解释了约 12%~14%部分,最多也不超过 1/3。对剩余差异来源,索希尔又通过大量实践调查做出了新的解释。她从职业培训角度将工作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工作提供大量一般培训;第二类工作提供大量的特殊培训;第三类工作几乎不提供工作培训。而女性主要集中在第一类和第三类工作形式中,这是由于结婚生育,女性必须将时间和精力分割在孩子、家庭和工作之间,其承担的家庭责任使得她们无法进行专门的职业培训,所以带来较高的离职率,只能被迫从事第一类或第三类工作,而这类工作的收入相对较低。因此,缺乏职业培训、就业机会不均是女性歧视的重要体现,也是男女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

除了关注职业培训缺失、同工不同酬等歧视外,索希尔还就 Bergmann(1971)指出的美国在平等资格下的就业机会不均等现象进行了统计分析。她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指出,虽然美国女性收入从 1974 年约占男性的 59%上升到 2015 年的 79%,还有 60%的女性获得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但事实上即便有着同样的学历背景,男女收入依然存在着差距,女性贫困的现状依然严峻。为此她指出,虽然有收入平等的立法,但实际应用的效果并不显著。她认为只有具有良好执行力的机会平等的立法,加上同工同酬立法,才能最终消除男女在收入上的差距。

此外索希尔还指出,如果年轻女性能够较早地防范离婚、失业等风险,并对自己的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儿童保育等方面做出合理的计划和安排,她们就有能力抵抗歧视,避免离婚所带来的贫困。

## (二)婚姻状况对贫困的影响

为了深入探究美国贫困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索希尔除了从上述女性歧视的角度研究贫困问题之外,她还通过对不同家庭结构收入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度剖析了单亲家庭、未婚生育、离婚等婚姻状况对产生社会贫困的影响。

索希尔等(Thomas & Sawhill,2001)较早关注到美国家庭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许多政策取向必须适应美国家庭结构的变化趋势,而近几年单亲家庭比例的持续下降将预示着美国福利政策的改进。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索希尔在近期出版的著作《漂流的时代:没有婚姻的性和生育》(Sawhill,2014a)中指出,婚姻状况是家庭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且单亲家庭是导致美国贫困代际相传的核心问题。她认为美国正分裂成两个阶层:一是“有计划者”,即有计划地结婚生育,表现为家庭稳定;二是

“漂泊者”，即无计划毫无准备地生育，表现为家庭极为不稳定。有数据表明，美国约有四成婴儿是非婚生子，30岁以下的女性约一半有非婚生子的经历，这些女性不仅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往往会在孩子5岁前选择离异。到2012年，美国有47%的单身母亲家庭中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单亲家庭的儿童贫穷率是双亲家庭的4倍，其中未婚生育的女性家庭贫困率尤为明显。为此索希尔认为，由于未婚女性所生的孩子贫困率更高，因此减少意外怀孕率将大大减少孩子出生后陷入贫困的数量。她还进一步提出，必须通过社会宣传来提高女性防止意外怀孕的意识，教育女性要采取安全、长效的避孕方法，从而有效地防止女性未婚先孕。

那么，单亲家庭为什么容易陷入贫困？为此，索希尔等在《因为爱情还是金钱？讨论家庭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Thomas & Sawhill, 2005)一文中首先将美国家庭结构划分为双亲家庭、单亲家庭、同居家庭三种类型。通过对三种不同家庭结构的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分析，索希尔等详细解释了单亲家庭婚姻状况的经济弊端，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从家庭潜在的收入能力来看，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收入更高，因为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多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因而具有更高的潜在收入能力。因此，潜在的劳动力是增加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参加工作的女性不断增加，但增加最多的还是已生育的已婚女性。在60%的婚姻家庭当中，夫妻双方都有工作，并且大约有1/4的双职工家庭的妻子收入高于丈夫。虽然结婚可能会减少女性的工作时间，但拥有两个劳动力的双亲家庭收入则远远高于单亲家庭。

(2)从非抚养方给孩子抚养费来看，非抚养方支付给孩子的抚养费是单亲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非抚养方经济能力的不确定性，因此抚养费的支付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同时抚养费的数量还取决于非抚养方的收入，这些都影响着单亲家庭的经济状况。虽然非抚养方所支付的孩子抚养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单亲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相比于双亲家庭，这些抚养费显然无法代替婚姻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更何况大多数非抚养方所提供的抚养费是非常有限的。

(3)从家庭规模经济来看，婚姻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另一个方式是通过扩大家庭规模经济。也就是说，相比单身生活，婚姻可以降低生活成本，从而相对地提高家庭收入。如就房屋租金来看，婚后双方

合住，要比两个人分开租房所支付的租金更少，从而增加了家庭收入。据统计分析，2003年美国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14824美元，而两个孩子的双亲家庭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18660美元。因此如果婚姻所带来的经济年效益平均大于4000美元的话，那么将会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4)从家庭的分工来看，婚姻对家庭经济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高效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会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情况下，妻子从事家庭事务，而丈夫从事家庭之外的工作。这种明确分工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此外，相对于同居伴侣，结婚能让双方的效率更高，更具生产力，而单亲家庭由于缺乏家庭分工，家庭生产力往往比较低下。

除了揭示单亲家庭容易陷入贫困危机外，索希尔等(Carlson, Meyer & Sawhill, 2014)还进一步分析了未婚生育、离婚等婚姻状况对贫困的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单亲家庭多数是由离婚造成的，但近30年来，单亲家庭的形成是由于未婚生育数量的不断增加。通过对这些人群的研究，索希尔等发现未婚生育的趋势也有阶层之别。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决定其对婚姻的态度，九成大学程度的女性都是婚后生子，婚姻状态也较为稳定，而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58%的首次生育是未婚生育，由于这些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在劳动力市场所遭遇的歧视和职业隔离更严重，只能做一些低收入、低声望的“女性化”职业，因此未婚生育的孩子往往更容易贫穷。此外，在种族、家庭背景、年龄、教育和就业状况等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未婚生育的女性还是比其他女性要贫穷2~2.7倍。而婚前偷食禁果是造成未婚生育数量增多的主要原因，也是女性失去教育就业机会并造成孩子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索希尔等提出年轻人应该认真慎重地考虑自己的人生规划，减少意外生育才能避免贫困。

毋庸置疑，离婚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为了说明离婚为什么容易导致贫困，索希尔等(Thomas & Sawhill, 2005)分析到，在美国每7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缺失父亲，不稳定的婚姻使得女性极有可能陷入贫困的泥潭。而通过对比黑人和白人的婚姻以及对比稳定和不稳定的家庭，他们发现经济困境是诱导许多家庭破裂的原因。为此他们选择大量单身男女通过模拟婚姻的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更证实了提高结婚率对减少贫困有着巨大的影响，离婚会导致女性失去生活信心，从而滋长了社会贫困，特别是儿

童贫困。在模拟实验中,结婚能够减少 65.4% 的贫困儿童,增加 43.2% 的个人平均收入,从而证明结婚对增加家庭收入,减少儿童贫困十分有利。

索希尔等(Thomas & Sawhill, 2005)关于婚姻状况对贫困影响的研究还表明,家庭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极大的。已婚家庭和同居家庭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虽然单亲家庭的孩子所能获得的补偿以及减少对已婚夫妇的征税可以带来一点经济利益,但还是无法取代婚姻家庭中共同承担开支和拥有第二个赚钱劳动力所带来的收益。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他们还通过对各个阶层及各种收入群体的研究发现,相比已婚单亲家庭的孩子,未婚生育的单亲家庭孩子更贫穷,同居家庭的孩子比单亲家庭的孩子富裕一些,但又比不上已婚双亲家庭的孩子。而目前婚姻政策对降低贫困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这仅仅考虑的是经济影响,没有考虑到家庭结构的重要影响。

总之,索希尔(Sawhill, 2016)十分重视单亲家庭、未婚生育、离婚等婚姻状况所造成的社会贫困问题,而教育、降低未婚生育率、扩大就业等措施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手段。索希尔(Sawhill, 2015a)特别鼓励年轻人要制定未来家庭规划,充分考虑未婚生育、离婚等风险因素,从而有效地减少家庭贫困的发生。

### (三)教育对脱贫的作用

索希尔(Sawhill, 2013)十分重视教育对削减贫困的积极作用,她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的动力,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素养对于脱离贫困有着重大意义,她号召政府应通过增加贫困家庭儿童早期教育、初级教育的投入来改变他们的教育水平。索希尔指出,对于孩子和低收入的家庭而言,高等教育可增加其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使其拥有更高的收入。她与同事(Sawhill & Karpilow, 2014)根据一组美国儿童的数据追踪发现,通过几年针对性的学校教育干预,可以缩短孩子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有助于改变儿童贫困的状况。索希尔(Sawhill, 2014b)还发现,虽然大学教育成本不断提高,但在就业市场上,拥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孩子一般具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索希尔着重阐述了教育摆脱贫困的四个主要路径。

(1)强化高水平技能教育。索希尔等(Murnane, Sawhill & Snow, 2012)研究指出,优秀的文化素养是 21 世纪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优秀的文化素养并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拼写或者阅读短文等

技能,而是通过阅读能力的提高,获取创新、分析、判断等技能。这种技能对于探索历史、科学、数学等领域的年轻人以及职业教育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高水平技能不仅有助于人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使他们有能力参与解决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美国职业结构变化图的分析发现,虽然近 40 年来,美国儿童的文化素质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劳动力市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些不需要较高知识技能的岗位,工资跌幅较大,而那些具备较高专业技术领域的工资待遇却始终呈现上涨的趋势,且市场需求还在不断地增加。因此强化高水平技能教育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

(2)提升父母的教育水平。索希尔(Sawhill, 2010)在研究贫穷和不平等的原因时指出,美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教育停滞不前。她通过数据对比表明,30~39 岁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成年人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她通过入学率和毕业率的数据分析得出,家境贫困的儿童很少能够上大学,能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教育缺乏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如果父母受教育水平低,那么家庭收入水平也会相应较低,无法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更无法走出困境。

(3)加强儿童教育干预。索希尔等(Ludwig & Sawhill, 2007)指出,对儿童进行有效的教育干预是提高儿童教育水平的重要措施。通过大量的实例说明,由于家庭背景、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儿童早期接受的教育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极大地影响了儿童未来的发展。对于早期教育较差的儿童,成年后其收入也相对较低。而较早地对儿童教育进行有效的干预会减少这种差距,从而能够提高他们进入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的机会。由此可见,儿童教育干预的本质就是为了提高未来劳动力的素质,使他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4)增强社会阶层流动的驱动力。索希尔等(Ludwig & Sawhill, 2007)还指出,社会阶层之间能够自由流动是美国人秉承的信念,教育是促进底层阶级向上层阶级流动的重要动力。但是,处于社会经济不利地位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极低,这大大降低了他们向上层阶级流动的可能性。因此,提高教育水平对解决美国儿童贫困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除了学校因素以外,家庭和社区等非学校因素也是儿童文化素质差异的重要原

因。父母是儿童早期教育的关键因素,父母可以通过分享阅读、增加与孩子的交流互动等行为,为儿童创造更好的早期教育环境,从而有助于增强贫困家庭向上层阶级流动的能力。

总之,索希尔认为教育水平的差异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因此她特别强调国家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加快推进教育发展,着力消除教育不平等,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和提高教师队伍水平。此外,她还认为提高教育水平,可以降低青少年未婚生育的概率,或在不稳定情况下结婚的概率,从而有助于降低年轻人陷入初始贫困的风险。

#### 四、对贫困问题其他领域的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之外,索希尔在美国社会流动性、社会不平等、福利政策改革等领域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为政府解决社会贫困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索希尔等(Isaacs, Sawhill & Haskins, 2007)指出,大多数美国公众认为美国经济的优势在于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容忍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因为觉得贫富差距可以通过经济流动性而改变,即社会底层的人可通过自身的努力晋升到社会的上层。为此,索希尔等将经济流动变化归为三类:一是绝对流动性,即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二是不平等性,表现为贫富差距;三是相对流动性,即位于经济阶梯上各个等级的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他们在经济阶梯上的位置。如果将整个国家的财富分布看成一个阶梯,经济增长使得这个阶梯整体都增高了,贫富差距表现为阶梯等级分布的稀疏程度,分布越密集则贫富差距较小,反之则较大;而相对流动性则是指不同等级人员结构及其比例的变动。只有不平等性和相对流动性才会导致贫困问题的产生。索希尔等(Sawhill & Reeves, 2016)发现,目前美国不仅仅是收入不平等性扩大了,其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大学升学率和毕业率等方面的差异也在扩大。

关于社会流动性和不平等性问题的研究,索希尔等(Isaacs, Sawhill & Haskins, 2007)特别重视研究美国的代际流动性及不平等性,认为相对流动性降低、贫富差距增加是阻碍改善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根据绝对流动性、不平等性、相对流动性三者的变化趋势,通过观察1947—2005年美国家庭真实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发现,美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7—1973年,家庭收

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8%;第二阶段为1973—1999年,美国经济增长减缓,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0.9%;第三阶段为1999—2005年,美国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0.5%,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放缓。而根据美国1937—2005年的工作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看,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中期,美国贫富差距是呈下降趋势,但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则持续增加。

此外,索希尔(Sawhill, 2015b)还研究了美国社会相对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并通过观察家庭跨代相对流动性数据和计算代际收入弹性两种方法来衡量经济相对流动性的大小。研究表明,孩子成年后收入对父母收入的弹性约为0.5,意味着如果父母收入比平均水平高20%,那么孩子会比同龄人的平均水平高10%。随着经济不平等性的加大,经济的相对流动性变得尤为重要,但是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社会经济流动性的增加可以抵消收入不平等。为此,在关于社会流动性的研究中,索希尔运用一种新的微观模拟模型——社会基因模型(SGM),着重分析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代际流动性变化的趋势,演示了社会底层阶级通往中产阶级的途径,还模拟了不同的政策干预对社会流动性所产生的影响力。

在关于国家福利改革方面的研究中,索希尔(Sawhill & Haskins, 2002)提出了为穷人建立个人发展账户,以改善其贫困的政策主张。事实上,个人发展账户制度是依据“资产建设理论”而创立的反贫困制度,秉承实现“美国梦”的思想。收入补助型扶贫是美国主流的扶贫政策,已实施了很多年,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这种收入补助型扶贫政策并不能使穷人拥有资产。让穷人拥有资产可以产生多种福利效应(如着眼于未来、更有自我效能、更积极地参加公民活动、改善子孙后代福利等),能够帮助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摆脱贫困。由于整个美国底层60%的人口的财富占有率低于5%,美国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严重。因此,通过建立个人发展账户、减免税收以及增加儿童储蓄账户等,可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积累财富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经济稳定。但是,美国目前的资产积累政策主要帮助的是非贫穷群体,因此,资产积累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应该将全体美国人纳入帮助范围之内,而不单单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 五、削减贫困的政策主张

综上所述,索希尔不仅关注贫困问题及其影响

因素的理论研究,而且利用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积极参与美国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制定。

1. 反贫困政策。索希尔明确指出美国贫困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索希尔等(Sawhill & Haskins, 2009)采用大量数据和图表,从工作率和工资、家庭构成、教育、移民四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贫穷和不平等的原因,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例如,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和收入出现了下降,男性的就业率也正在下降等。因此,可以针对性地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工作机会、强化家庭结构三方面着手,以应对贫困。索希尔等指出了一个较为简易可行的方法,即实行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抵免劳动所得税的组合政策。虽然这项建议并非完美,但这将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实现政府与公民“双赢”的局面。索希尔等(Sawhill, Thomas & Monea, 2010)还进一步提出了三线作战和四大策略,旨在从教育、家庭和工作三方面遏制贫困恶化,目标是创造机会型社会,同时还主张提高教育水平,提升工作质量,增加工作岗位,防止无业群众群体的扩大,强化家庭结构,提高家庭支付能力。索希尔等(Sawhill & Venator, 2015)还向政府建言,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落实缩小工作差距,实施工作支付、育儿援助、带薪休假等措施,在教育方面主张在各年龄段分别投资,帮助贫困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等。

2. 针对单亲家庭政策。索希尔等(Thomas & Sawhill, 2005)向政府建言应积极制定针对单亲家庭以及鼓励单亲父母再婚的政策,将对改变儿童贫困有着积极的作用。她通过对全国家庭收入数据的研究,认为单亲家庭(尤是指未与他人同居型)的收入较少,也更贫穷。因此,政府首先应制定提高单亲家庭最低工资水平的政策。同时,为了降低单亲家庭出现率,政府还应制定避免个人意外怀孕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通过媒体宣传,加强女性对避孕的认识,从而避免未婚生育、离婚等行为。索希尔等(Sawhill, Thomas & Monea, 2010)还指出,政府应该采取“规模化”的宣传计划,如实施预防青少年怀孕计划,鼓励更安全的性行为,在买不起避孕用具的人群中,拓宽有效避孕渠道,扩大避孕药的医用补贴,提高弱势女性的受教育机会,从而提高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认识自身的价值。

3. 福利改革政策。索希尔等(Sawhill & Haskins, 2002)认为,福利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建立健全国家就业保障体系,为穷人和低收入家庭提供一系列救济项目,主要包括各州政府实行的最低收

入保障、所得税减免、儿童税减免、收入补贴项目、医疗保障、儿童强制保障等措施。索希尔提出福利改革目标是减少贫困,贫困问题作为一个国家性的问题,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责任。政府应鼓励企业接纳福利接受者;通过实施公共资金资助就业和培训计划,提高穷人获得就业的技能和机会;加强贫困人群工作的财政激励,以提升他们及子女的基础教育水平。此外,索希尔还提出为穷人建立储蓄和资产个人账户。这对政府改进现有贫困人口福利政策具有较大指导意义。她强烈支持实施带薪休假政策,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减少社会贫困具有的积极作用。

## 六、简评

索希尔是在社会政策、福利改革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开创性学者,她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包括财政政策、经济增长、贫困、教育、不平等、福利改革,女性歧视、弱势儿童群体、婚姻家庭等。她的很多见解在过去40年里一直影响着华盛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她出版的大量论文和专著,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经济学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影响。她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所担任的角色(包括对女性歧视和女性贫困的认识)。她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是引领了一个时代,为其他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概括起来,索希尔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领域:(1)贫困的测度及社会底层阶级的重新界定;(2)女性人力资本歧视对贫困的影响;(3)贫困根源问题的探讨,家庭结构尤其是婚姻对贫困形成的影响。

索希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她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十三五”期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建立贫困人口及家庭数据库,完成我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基数,为实施精准扶贫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利用微观数据,加强研究家庭结构对我国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残疾人、失独家庭、重特大疾病家庭等特殊群体的贫困根源。三是利用微观家庭数据,评估我国教育脱贫、产业脱贫、旅游脱贫、光伏脱贫、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等脱贫政策的有效性,并理解其发生机制,有利于政府适时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脱贫政策。

## 参考文献:

- Boshara, R. (2005),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counts: Policies to build savings and assets for the poor", *Progress i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7(8):439-446.
- Carlson, M. J., D. R. Meyer & I. V. Sawhill(2014), "Family complexity: Is it a problem, and if so, what should we do?",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4(1): 240-244.
- Haskins, R. & I. V. Sawhill(2009), *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Isaacs, J. B., I. V. Sawhill & R. Haskins(2007), *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Ludwig, J. & I. V. Sawhill(2007), *Success by Ten: Intervening Early, Often, and Effectively in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Path to Prosper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Murnane, R., I. V. Sawhill & C. Snow(2012), "Literacy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roducing the issue", *Future of Children* 22(2):3-15.
- Orshansky, M. (1965),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8(1):3-29.
- Ricketts, E. R. & I. V. Sawhill(1988), "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underclas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7(2):316-325.
- Sawhill, I. V. (1973),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Some new finding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8(3):383-396.
- Sawhill, I. V. (1976), "Discrimination and poverty among women who head familie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3):201-211.
- Sawhill, I. V. (1988), "Poverty in the U. S.: Why is it so persist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3): 1073-1119.
- Sawhill, I. V. (2003), "The behavioral aspects of poverty", *Public Interest* 153:79-93.
- Sawhill, I. V. (2013),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opportunity gap", The College Board, Oc. 8,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highereducationandtheopportunitygap>.
- Sawhill, I. V. (2014a), *Generation Unbound: Drifting into Sex and Parenthood without Marriag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awhill, I. V. (2014b), "Target aid to students most likely to succeed", *Education Next* 14(2):59-63.
- Sawhill, I. V. (2015a), "Purposeful parenthood: Better planning benefits new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Education Next* 15(2):51-55.
- Sawhill, I. V. (2015b),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Be afraid", *Social Mobility Memos*, May 27, 1-8.
- Sawhill, I. V. (2016), *An Agenda for Reduc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Opportun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awhill, I. V. & R. Haskins(2002), "Welfare reform and the work support system", *Welfare Reform & Beyond Policy Brief*, No. 17,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awhill, I. V. & Q. Karpilow(2013), "Strategies for assisting low-income families", *The Social Genome Project at Brookings*, July 1, 1-33.
- Sawhill, I. V. & Q. Karpilow(2014), "How much could we improve children's life chances by intervening early and often?", *CCF Brief*, Vol. 54,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Brookings.
- Sawhill, I. V. & R. V. Reeves(2016), "Modeling equal opportunit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2):60-97.
- Sawhill, I. V. & J. Venator(2015), "Improving children's life chances through better family planning", *CCF Brief*, Vol. 55, Center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Brookings.
- Sawhill, I. V., E. Rodrigue & N. Joo(2016), "To help low-income American households, we have to close the 'work gap'", *Social Mobility Memos*, May 31, 1-7.
- Sawhill, I. V., A. Thomas & E. Monea(2010), "An ounce of prevention: Policy prescriptions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fragile families", *Future of Children* 20(2):133-155.
- Sawhill, I. V., S. Winship & K. S. Grannis(2013), "Pathways to the middle class: Balancing personal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9(2):47-54.
- Thomas, A. & I. V. Sawhill(2001), "For richer or for poorer: Marriage as an antipoverty strateg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1(4):587-599.
- Thomas, A. & I. V. Sawhill(2005), "For love and money? The impact of family structure on family income", *Future of Children* 15(2):57-58.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刘洪愧)